

# 热血青年投革命 干部大队援西北 (一)

## ——西北局举办回族干部培训班始末

拜学英

1949年4月,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和朱德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国民党政权在西北的统治如秋风扫落叶般土崩瓦解,解放区急需大量干部做接管等工作。中央决定成立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学校,对进步青年进行短期培训,由1800名干部组成西北干部大队支援西北,根据西北民族地区的实际,又将98名回族干部组成一支分队,随西北干部大队经过25天行军,到达西安后分赴各省工作。西北局根据叶仲勋同志的指示,对回族干部专门举办了一期培训班,时称“回干班”,培训班结束后又对年龄较小的16名回族学员在西北党校进行半年培训。

###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成立及其对进步青年的培训

1949年初,全国解放在即,党中央鉴于新中国成立必须有一支自己的干部队伍做解放区的接管等工作,决定在华北、华南、西南、中南、华南、东北各大行政区先后组建成立以培养青年干部为主的革命大学,吸收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入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就是在此形势下于1949年2月由中共中央华北局开办的短期干部培训学校。校址设在北平西郊万寿山湖畔之西苑兵营大院内,原是八旗大校所在地,曾是禁卫军兵营,在天津设有分校。招收学员1.2万余人,其中天津分校300余人,学员以学生出身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机关、工厂、学校职员教师,还有少部分商贩、旧军人和失业工人等,女学员占五分之一。招生和考试地点在宣武门内靠近城墙不远一个王府大院内。学校1000多名工作人员大多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内战、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华北局第三书记刘澜涛担任校长,原华北局党校副校长胡锡奎任主持校务的副校长。学校设教务处、政治处、校务办公室,校部内设四个部和一个分校,每部设教育、组织、总务3个科室及秘书室,每部十班,学员250人左右,学员们被编为大队、中队、小组。每班有正副班主任和干事六七人。每小组设有正副组长,协助班干部工作。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在当时的革命大学中,不仅成立时间早,办学规模大,更因为推行马列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大门。

主义教学和开展思想改造等做法,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认可。1949年8月5日,毛泽东肯定并转发刘澜涛、胡锡奎《关于华北革大第一期12000余名学员教育情况的报告》,要求党内各级学校仿效和传播,使这一模式成为解放区政治学习运动的经验。艾思奇评价称“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醒,为国家建设提供了一个最普遍的政治基础”。华北革大成为国统区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等人员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旧思想的一座“革命熔炉”。学校还于1949年9月5日复刊了校刊《熔炉》。

鉴于国统区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社会动荡造成的失业失学知识分子、学生、职员等群体积极寻找进入解放区,适应新社会的便利通道,报考华大和华北革命大学的学员踊跃,但动机复杂,既有追求革命进步的理想,也不乏为解决现实生活或职业出路的“镀金”思想的人。学校决

定对学员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和思想改造,并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形成了实践群众路线的经验。因是工作之需的短期培训,课程以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当前形势政策、共产党建设及党史等内容为主,邀请有关领导同志和学者作专题报告和讲课,朱德总司令作政治形势和学习问题的报告,薄一波主讲政治形势,黄敬讲人生观,安子文讲党建和党史,杨献珍讲唯物史观,艾思奇讲哲学和社会发展史,冯文彬、陆平作建国报告,宋平介绍苏联共青团,刘宁一讲世界各国情况和中国革命对世界的影响,郭沫若介绍苏联情况等。课程设置少而精,教学形式灵活多样,全部课程以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党史、党纲等的教育,分为“教育计划与教学方法,世界观与人生观,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理论与政策”三个较为连贯的教学阶段,并需要根据增加若干辅助性课程和社会活动。教学形式采取讲授、自学、讨论等形式。在教学流程与教学策略上,通过思想总结衔接不同阶段的课程,每学习一段理论,进行一次测验,之后进行一次思想检查和总结。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一个重要环节,学校依据学员思想实际与革命表现,筛选培养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团组织。学校实行供给制生活,为学员们发放灰色粗土布服装和鞋袜及八角帽,开设集体灶,主食多为东北高粱和大锅菜。起初无回民灶,随后为方便回族学员,设立了回民灶。

(作者简介:拜学英,中国作协会员,宁夏文史馆研究员,现供职于宁夏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 宁夏党史大事记 (九)

邢万莹

**1933年5月** 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爱国将领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孙殿才任同盟军军部支部书记和前委巡视员。张子华受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指示,动员宁夏籍学生王子端、潘钟林、苏印泉、苏康泉、张国柱等人参加抗日同盟军。

**1933年7月** 中共党员李天才在北平门头沟从事工人运动时,被特务盯梢而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遭敌杀害,牺牲时年仅26岁。

**1933年7月** 中共陕西省委遭敌破坏,省委书记袁岳栋和省委领导成员杜衡等人被捕叛变,供出中共陕甘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及负责人,中共甘青特委遂遭破坏。梁干臣在兰州被捕后遭敌人杀害,张德生、常黎夫等人脱离危险,离兰赴陕。中共甘青特委领导下的宁夏工作被迫中断。

**1933年8月** 绥远省中共临河县遭敌破坏。县委决定派中共党员赵子明(房鲁泉)到宁夏开辟工作。赵子明到宁夏省城后,利用自己懂点医术的条件,经过警察局考试,领取行医执照,在《大公报》报馆附近,挂牌行医。

**1933年9月** 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孙殿英欲进军宁夏、甘肃开赴青海。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利用这一机会,策动孙殿英攻打宁夏。张子华、孙殿才根据党组织指示,动员宁夏旅平学生会成员王子端、谈尚彦、樊应福等人参加孙殿英部,并致信孙殿英,推荐梁绍武、刘复统等地方武装,准备在孙部进攻宁夏时予以协助。

### 宁夏革命英烈

## 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 (中)

邢万莹

1940年4月13日,崔景岳正在吃晚饭,马云泽推门进来,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交给崔景岳。信中简要地写着:让老崔星期六到省城来一趟,有要事商量。信尾落款是杜琳。崔景岳看信后,打扮成商人,带着马云泽开的证明,骑着自行车上了路。

省城按照预约与杜琳接头。一会儿,只见杜琳匆匆地从学校赶回来,向崔景岳报告了准备发展党员的情况。崔景岳和杜琳接触过几次,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谁料,就在当夜12时左右,他俩刚刚睡下,宁夏省党部调查室主任马孝贤、中统特务李郁华和军警联合督察处中校科长徐宝璋带领20余名宪兵冲入杜宅,将崔景岳和杜琳一起五花大绑,押往了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

马效贤和军警联合督察处主任高中第首先提审杜琳。杜琳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承认自己是抗大学生、中共党员,直接领导人是李仰南,崔景岳是李仰南给他介绍的。接着,敌人连夜审讯崔景岳。

当敌人从崔景岳身上搜出马云泽写的采购教具的证明后,厉声问道:“你是干啥的?”“我是商人,宋澄堡小学的义务教员。”

高中第根本不信,接着又问:“那你和姓马的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同学。”敌人反复审问,崔景岳机智应答。马孝贤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命令给崔景岳上刑,压杠子的人由原来的2人增加到4人,又由4人增加到6人。剧烈的疼痛,使崔景岳昏了过去。匪徒们用冷水把他喷醒。马孝贤继续逼供,崔景岳仍拒绝回答。敌人见得不到任何供词,又令打手把崔景岳吊在审讯室外的柱子上,用皮鞭使劲抽打。崔景岳紧闭着双眼,忍受着敌人的残酷折磨。不一

会,崔景岳什么也不知道了……

敌人根据杜琳的招供,派徐宝璋带领宪兵先后去宋澄堡、董府、中宁、同心等地抓人,形势急剧恶化,宁夏地下党的同志又有一些被捕。在敌人的酷刑威逼下,崔景岳派去延安送信的江生玉叛变了革命,不但供出了崔景岳是中共宁夏工委书记,而且还供出了崔景岳让他给延安送的密信。

敌人拿到密信,如获至宝。但捧着一张白纸,却不知道上面写的是的什么,便狠命地拷打崔景岳,逼问用什么方法显字。看着这份极其重要的报告落到敌人手中,崔景岳心急如焚。他知道这封密信上写着整个宁夏党的组织情况,一旦被敌人掌握,就会立即给党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后果不堪设想。他沉吟片刻,镇定地说:“我给你显字!”狡诈的敌人不肯给,接连问:“用什么显字?”“用五倍子水。”崔景岳明白,只要敌人将密信泡进五倍子水里,文件信立即就毁了。狡猾的敌人拿来五倍子水,先将信的一角试了一下,纸角立即变成了黑色。敌人勃然大怒。后经叛徒招供,敌人将碘酒涂在密信上,字迹显现了出来。

案情迅速扩大,特务按密信中提到的地点,四处抓捕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一天,敌人又拿了一份名单,要崔景岳辨认哪些是中共党员。崔景岳机智地拿起毛笔,把敌人四大厅八大处的头面人物,用笔圈了不少。特务们接过名单一看,气急败坏,立刻把崔景岳吊起来打,压杠子,坐老虎凳、揭背花,各种酷刑轮番上。可是,有关宁夏党组织的情况却无法从他嘴里掏出一个字。

敌人还在疯狂抓人,牢房一天天拥挤起来。一天,牢房里关进来几个从边区来的老乡。通过交谈,崔景岳知道他们都是定边的商

人。于是,问他们能不能帮助捎信到边区,这几个商人答应了。

5月14日下午,在难友的掩护下,崔景岳给中共边区党委和中共三分边区负责人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汇报了宁夏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斗争的情况。信中还写到:“现在在生死关头和各种卑劣的威胁中,我当然抱定最后牺牲的决心。请将此事告知中央……”崔景岳在敌人淫威面前,表现了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同志们的关怀之情。5月22日,改军法处把崔景岳押到宁夏第一模范监狱,与崔景岳一起被转押的有孟长有、马云泽、白玉光、王博等人。

牢房阴暗、潮湿、狭小,长年不见太阳,臭虫、虱子随手一摸就是一把,屋子空气污浊,臭气熏人。这些崔景岳都能忍受,他日夜思考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教育和组织同志们坚持长期的狱中斗争。他们几经商量,决定成立狱中党支部,崔景岳担任党支部书记。大家明确了党支部今后工作的三项任务:一是进一步与敌人斗争;二是设法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三是保护好身体,以利再战。

狱中党支部建立后,首先组织开展了团结难友,争取自首分子,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名的政治斗争。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许多同志团结一致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的动摇自首分子也逐步坚强起来,拒绝在敌人写的“反共宣言”上签字。如杜琳,开始经不起敌人的拷打,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暴露了宁夏地下党领导人,有严重的自首叛变行为,后来在崔景岳的争取、帮助和其他同志的影响下,也有很大的转变,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名,敌人无计可施,只好给杜琳锁上脚镣带下去,并把崔景岳单独押起来,不准与其他难友见面。

(作者系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共党史专家)

## 移民岁月 第三十九期

# 从松花江畔到黄河岸边 (三)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赵之班:我在金积县干着催收公粮、征兵、剿匪、收枪等工作,干了两年。金积县的干部当时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十九兵团转业营以下干部,二是从陕北过来的干部,三是我们这些刚走出校门的青年。金积县就我一个女干部,工作起来很不容易,情况又很复杂。金积县党委部门在关帝庙办公,只有县委书记房间里有一部电话机。关帝庙里有很多平房,有时干部都下乡去了,就我一个人,关老爷握着大刀,旁边是八大金刚,风吹来的小石头打得大门当当响,吓的人一夜睡不着觉。剿匪时不敢在老百姓家住,因为不知道底细。一次我们几个人下乡,晚上住在寺庙里,就让我一个女的睡在一口棺材里,当时真的很苦。

我在金积县汉渠桥搞土改。当时从北京来了几位大干部,一位是水利部的部长李辅仁的弟弟李辅德,是德国留学回来的;一位工程师叫王瑞生,也是留学生,让我带着他们。宁夏人说话,他们一句都听不懂。白天干工作,经常晚上开会。民兵握着枪,站在桥头,护送我往乡政府走,走一段路,民兵喊一声“小赵”,我答应一声,一直把我送到乡政府,那个民兵才回去。划阶级成分时,还来个乡的地主、富农划了成分。一次下乡碰见一位老人牵一匹马,马上骑着一个胖子,像是有钱人家的少爷,我用枪逼着胖子下马,让老人骑上马,让胖子拉着马。

我8年没回过一次家,家里也不给我来信,电话更没打过一次。有一次,一个通讯员把我叫到区委书记那里,桌子上摆着四盘菜,我进去后,屋子里的人敲起了掌。一个人说,你先坐下听我说,今天请大家来我要跟小赵订婚了,为我们做个证。我听了既吃惊又生气,我才15岁,区长都35岁了,与我订什么婚呢。我一气之下把桌子上的菜打落在地,跳起来跑了。跑到渠坝边伤心地哭着。

我那时很苦恼,想着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正好遇见新华社一位记者郭普民,他是西安人,大我10岁。我们接触后,他说你这么年轻,记忆力又好,脑子好使,还懂诗词,不上大学太可惜了。他就鼓励我看书学习,努力向上。每次带给我几本新书,因为他是新华社西北分社驻宁夏记者站的记者,有条件找来各种书籍,还有高尔基的作品。每次让我看后,写出读书感想,我不会写,他就教我怎么写,后来他还给我办了《中国青年报》《群众日报》《宁夏日报》的通讯员证。先逼着我每月写几篇新

闻稿,写出的稿子错别字多,他就买来新华字典说,不会的字翻字典,再写错了要罚你。哪个字写错了,他用红笔画出来,让我再写10遍。两年间,他对我帮助很大,我的进步也很大,他像哥哥一样要求我,是我的良师益友。

他也喜欢诗词,常与我聊诗词。他的心眼好,脾气也好,长得也帅。1951年6月他受新华社总社调遣,赴抗美援朝前线做战地记者。他走时留给我20多本书,告别时拿着自己的一张照片说,你要是喜欢我的话,3年后咱们在北京十七孔桥上见,到那时我要看你写的日记,你也看我的。看我们互相进步学习,写字的好不好。在他的鼓励下,我练钢笔字、铅笔字、粉笔字,看书学习写日记,提高进步很快。因为常给报社写稿,被抽调到省妇联工作,后来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岗位。我能走上这条路,与郭普民的引领启蒙是分不开的,他是我走知识女性这条路的动力。

1951年8月25日,郭普民穿上军装,坐着大卡车,跨过鸭绿江到了朝鲜的新义州,趴在汽车引擎盖上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没想到朝鲜战争如此艰苦,如此危险。如果我回不去,希望你忘掉我这个,但是不能忘记我对你的期望。我愿你考文科大学,学新闻、文学都可以,走一条知识女性的路子,因为你有这个天赋。当天晚上,新义州下着雨,美国的飞机到处轰炸。郭普民他们的车停在青山一个水洼旁,因为下雨路滑,致使车侧翻,郭普民和一位18岁的警卫员当场牺牲。刚到朝鲜的第一天他就这么走了,70多年过去了,这个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每当苦闷难受时,想起他那么有才华,年轻轻的就牺牲在朝鲜,我苦点累点又算得了什么呢。后来,我患上了癌症,觉得没什么希望了,就把写的许多文章,还有以郭普民为原型写的一部小说《染血的白菊花》全烧了。

我后来写了多篇散文,多半都是怀念郭普民的。他是我尊敬的兄长,是我最好的朋友,别人代替不了。我这一生,把感情都给了他。我曾到陕西民权厅找烈士纪念馆,寻找他的名字,又到他的老家找了两次,没有结果。后来我在网上给他立了墓碑,写了许多文字,许多人读了很受感动,新闻网上还出现过他的一幅大照片,还有新华社给他立的墓碑。1958年在朝鲜会仓郡金矿上建了烈士纪念馆,第一个名字是毛岸英,郭普民的名字在第四排,虽然超过了70多年,但保护得很好。

(拜学英 李青峰 整理)

## 绘制宁夏发展蓝图的高级建筑师——张亮 (三)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经过谈判打打的拉锯之后,又引入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四个中立国家充当中间调停国。中朝双方秉持的原则是寸土必争。为了保持中立的形象,四个中立调停国代表团的居住地不能在美军、志愿军或朝鲜人民的任何一方,必须有独立的住处。经过谈判,最后达成一致,同意由中国派出专家,在三八线中央,设计并建成四个中立国的临时驻地。为此,张亮又被紧急召入设计专家团队,第二次进入朝鲜。

张亮:1953年我又被紧急抽调到朝鲜,我们现在电视里经常能看到的板门店军事分界线中的四栋蓝色房子,就是我被紧急抽调到朝鲜后,按照停战谈判必须遵守的技术规范,在三十八度线上建起来的。没想到这几栋绿皮房子用了70多年,现在还在用,很有历史意义。不知道后来改造过没有,当时的外形和内部结构完全是我们设计的。现在看起来很有意思,四个中立国的谈判代表小组,每家一栋,都是有钢筋骨架的钢板结构房。

据张亮介绍,当时参加中立国居住地项目设计的设计人员也就十来人,如果这些人还活着,估计都在九十或百岁了。第二次入朝工作量不大,设计难度也很平常,费时不长,项目完成后他又回到东北,继续参加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设计。当时中苏关系处在蜜月期,很多项目都有苏联建筑专家的参与,提出了很多设计建议,这也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了国外前沿设计理念。重要的是哈军工的负责人陈康大将也常常来到设计室,提出设计和使用构想。

陈康早年曾考人黄埔一期,是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家,战场经历颇具传奇,对军事教学中有着独特的理解,在哈军工建设过程中,对院校教学体系的分配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都有独到的理解,对学科项目设计与建设过程中应克服的问题都提出过很多专业性很强的建议。

张亮:当年哈军工是陈康在负责,陈康的个子不高,很壮实,腰板挺的很直,说话嗓门洪亮,行事特别果断,也特别尊重设

计人员。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陈康经常到我们设计室去,有时候陈将军看我们在画图,也过问些设计理念和设计进度问题,有时候会提出一些新的设计理念和建筑外观修改建议,总的要求就是让新建设的哈军工既好看,又能满足军事教学的需要。哈军工共有5个系的系教学楼、工兵系、空军系、海军系、炮兵系和指挥系。我的设计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得到了领导和专家的高度信任,很多主要的设计项目都交给我单独来做,哈军工对我来讲是个很大的项目,一共完成了3万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大概半年左右拿出了完整的工程设计图纸,很快就得到了批准。1954年哈军工开始建设,我又被派到监造部门负责工程监造,相当于现在的工程监理。施工中钢筋水泥的配比、硬度、跨度、混凝土施工的温度、梁体的承重等一切与建筑有关的事情,都必须到场,检查合格后签字再开始施工。所有的项目都按军事标准进行。很多当年建设的工程到现在还在使用,这与当时的建筑设计严谨、施工标准高和严把质量关有直接的关系。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口号,但所有的技术节点都严格执行标准规范,一丝不苟,不敢有半点马虎,更不能有半点差错。

1955年,张亮再次被调回北京。到了中央军委设计院,还属军队系列,现在的名称是军委总后设计院,这个设计院是由周恩来总理批准筹建的,因为保密度高,全部人员都要经过严格审查,并由周总理亲自批准才能调入,调入的人员中,大批是原中央设计院的技术骨干,承担的主要工作是国防保密项目的建筑设计,当时军委三部总后办公楼及辅助建筑都出自他们之手。

1956年,已经具有三级设计技术资格张亮又迎来了人生的一个大转变,作为业务骨干,他获得了进入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习的机会,开始接受系统的建筑设计理论学习教育,后来这所院校被并入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1958年张亮被分派到宁夏。

(拜学英 简银生 整理)